

试论翻译文学的归属及其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田双艳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 本文旨在论述翻译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相对独立存在形式,可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元并存。判断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亲疏关系的关键依据在于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异。与源语文学相比,如果翻译文学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变异程度不大,那么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于外国文学;相较于传播国文学,如果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已发生较深的他国化变异,则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并可以无限接近于中国文学。

关键词: 翻译文学; 归属; 外国文学; 中国文学; 关系

引言

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主流学术观点是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主要原因在于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谢天振先生并未从学理层面正面论述把翻译文学归于中国文学的理由。笔者拟在下文中陈述这五种观点,并详细剖析这五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综合运用译介学理论中的“创造性叛逆”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中“文学的他国化”理论详细剖析翻译文学的归属及其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1 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是贾植芳、施蛰存、谢天振、王向远和王宁。其中以谢天振倾力最多。贾植芳在1993年《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序言中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我们还把翻译作品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与之类似的做法是施蛰存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编了三卷《翻译文学集》。施先生认为:“外国文学的汉译本,应当列入中国的文学书目。”^[2]贾植芳和施蛰存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原因在于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近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中,尤以谢天振教授倾注的心力最多。

2 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为王树荣和施志元。针对贾植芳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和施蛰存把三卷《翻译文学集》纳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做法,王树荣表示不满。王树荣在1995年的《书城》杂志上撰文指出:“翻译文学怎么也是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呢?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国文学’?”与王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为施志元。王树荣发表《汉译外国作品是“中国文学”吗?试与贾植芳、施蛰存先生商榷》一文之后,谢教授就此观点在《书城》杂志发表《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与王树荣先生商榷》一文反驳。此后,施志元发表《汉译外国作品与中国文学——不敢苟同谢天振先生高见》一文对谢的观点进行反驳。施在此文中指出:“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总之,两派观点在《书城》杂志上前前后后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交锋。

3 翻译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存在形式,应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元并存。

而在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就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亲疏关系,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是足鼎立的关系。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刘耘华和宋学智。而持此观点的学者并未阐释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亲疏远近。刘耘华认为:“我们的确应该给翻译文学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的地位……翻译文学正因为是中介性的,所以才是相对独立的。”宋学智指出:“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符合当今学术研究的多元态势……由翻译文学构成的这座桥梁,在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理清翻译文学归属的关键在于必须要弄清楚由外国语言文字转换为中文的文学作品,其话语规则、意义生成方式和学术规则是否发生了变异以及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是否深到传播国文学本身的话语规则已被接受国的文化规则根本所化的程度。就此问题笔者将会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4 运用“创造性叛逆”及“文学的他国化”理论分析“翻译文学的归属”

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学界之所以会出现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局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未能准确地运用恰当的学科理论分析这一问题,即未能从学理上清晰阐释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在学界过去 30 多年里对于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探讨中,大多学者是运用单一的学科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比如谢教授主要运用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核心概念对翻译文学归属进行阐释,得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的结论,从而简单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另一些学者用变异学中“文学的他国化”这一理论分析翻译文学的归属,得出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结论或将话语规则未发生变异的翻译文学归入外国文学,把话语规则发生他国化深层变异的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笔者认为只有准确综合地运用恰当的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才能从学理上清晰阐释翻译文学的归属这一学术问题。在我们开始正式探讨翻译文学的归属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这两个概念作一个清晰的界定。关于这两个概念,王向远教授在《翻译文学导论》中有清晰的界定。“‘外国文学’是外国作家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的主要供本民族读者阅读的作品文本,‘翻译文学’是翻译家由原语转换为译语的主要供译入语读者群阅读的文本。”但是不管译者怎样在思想内容上追求忠实于原文,译介过程中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原作者的意图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译者的风格与原作风格之间存在差距。“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所提出。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事实上,正是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这一客观现象的存在使得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距离,既然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之间存在距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就无须赘言了。“文学的他国化”这一概念由我国学者曹顺庆教授所提出,从上述对“他国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定义判断他国化是否发生的关键依据在于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是否已发生根本改变。依据该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判断翻译文学是否为中国文学的关键依据在于与外国文学相比,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和文化规则是否已经发生中国化的根本改变。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有两种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是印度文化,另一个是近现代的西方文化。自清末民初以来,大量西方小说的引进大开国人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带来异质营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但是由于

我国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至今不过百年的历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翻译文学还尚未完全被中国文学所消化吸收,这些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和学术规则是未发生他国化深层变异的。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翻译文学既不是外国文学,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学的结论。然而我们应注意到的是,还有一些翻译文学作品的话语规则已经发生他国化的根本改变,比如林译小说和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把重语言的印度文化规则转化成不重视语言的禅宗顿悟,“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中国文化规则。我们可以把这类文化规则已发生他国化根本变异的文学作品纳入中国文学。但是鉴于文学的他国化这种深层变异并不会经常发生,我们目前还是把翻译文学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较为科学稳妥。

至于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亲疏关系,笔者认为应视其变异程度而定。笔者认为,判断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亲疏关系的关键在于其话语规则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异。与源语文学相比,如果翻译文学的变异程度不大,仍保留了较多传播国文学的话语规则,那么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于外国文学。比如美国名著《飘》被傅东华译为中文,但是其文化规则并未发生深层变异,因此《飘》更接近于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比,如果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发生了较为深层的变异,则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于中国文学。

结语

本文运用译介学理论中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核心概念论证了翻译文学不属于外国文学,又运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中的文学“他国化”理论论证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翻译文学不是中国文学,进而得出“翻译文学既不完全不是外国文学,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学,而应该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类型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元并存”这一结论。正是翻译文学把外国文学中的异质营养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中国文学,给中国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才使得中国文学这条河流生生不息地流淌、不断地更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言[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 [2]施蛰存.我来“商榷”[J].书城,1995(4):23.
- [3]谢天振.为“弃儿”寻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J].上海文论,1989(6).